

# 历史的沉思

论文理两科方法论的共同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和作为对象的  
马克思主义

“可分的”还是“分立的”？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一段话  
的质疑

对人性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分析

历史的沉思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延续  
原因的探讨

试从信息流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

三十年来我国需求大于供给趋势的  
初步探讨

我国现阶段个体所有制经济的类别  
和性质

婚姻问题初探

谈谈牛虹的感情



青 年  
文 稿

6292/07

# 目录·提要

## 论文理两科方法论的共同基础（李湘鲁）（1）

人们常常认为文理两种方法有本质的差别，其实，作为科学，它们是建立在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史上，理科，主要是物理学，最先把精密科学的奖杯拿到手，最早使用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和实验法。人们一般把这三种方法叫作理科方法。十九世纪的“理科方法”无法应付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复杂现象。用“理科方法”治人文科学的，有人，但不成功。所以人文科学不得不使用很多过时的，含混的方法。

人文科学方法的改造在二十世纪新的科学规范——随机和系统思想，新的技术手段——电子计算机出现后才有了可能；理科随着涉及更复杂的对象，也变得有了文科味道，这里指的是较多的综合。科学方法的新发展是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是文理两科方法论的共同基础。

## 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和作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 （梁中锋）（12）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即是人们探索客观世界的工具，又是人们研究的对象。科学与迷信水火不相容，它不容垄断，它必须发展。要害在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把客观事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同时又把自己作为需要被研究、被发展的对象；允许事实的比较，对照和检验，马克思主义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生存发展和最起码的条件。

“可分的”还是“分立的？” (曹南燕) (18)

###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一段话的质疑

作者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中有关段落的考证，指出《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转述黑格尔关于可分性问题的观点时，可能出现了一个笔误。这一笔误使人们对于可分性问题的辩证观点产生了重大误解，因而有必要予以更正。

### 对人性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分析 (胡平) (23)

本文对人性研究中四个问题作出了一些分析：关于人的本质，关于抽象人性，关于利益对抗与共同人性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可变性与不变性问题。

文章对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中那句著名论断提出了新的理解：对否认抽象人性一说表示了异议；指出在存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之处也常常有着共同人性；强调对人性的变与不变作一种生动的辩证的认识，文章认为：人性变化的最大特点在于，人是通过自身独具的本性的活动去改变自己、创造自己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变性正是人的不变的本性。

### 历史的沉思 (金观涛 刘青峰) (32)

####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

本文是应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的一次尝试。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分别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几个方面，探讨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但很少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周期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周期性，是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呈周期性出现的两、三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大动乱，改朝换代。

文章抓住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与周期性这两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及作用机制入手,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模型。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稳定性正是这种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

文章分析指出,在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要维持大一统的封建超级大国的统治,就必然要使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高度一体化,组成相对脱离经济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机构。并进一步分析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土地兼并趋势,以及官僚政治所必然产生的机构庞大和腐化趋势。这是两种瓦解封建国家的恶性膨胀的力量。解决这两个社会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靠大动乱来消灭它们。然而,这种大动乱是没有播种的耕耘,没有“立”的“破”,破坏了生产力的积累和进步。文章还从超稳定系统出发,对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如农民战争的作用、土地所有制、封建王朝的变法改革、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试从信息流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白南生)(70)

用四种流的方法研究经济过程,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本文独辟蹊径,从信息流的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近三十年来,人们对信息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文章提出,在分配中应尽量减少信息传递的损耗,并保证信息的丰富性。通过简要的历史比较和一个“基本工资加分成工资制”的具体设想,文章论述了应根据在分配中的功能合理划分考核指标,并将这些指标组成一个并联的信息通道。

### 三十年来我国需求大于供给趋势的初步探讨

(黄江南)(82)

本文从指令性计划体制与我国现实经济条件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分

析了几个主要方面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探讨了矛盾产生的原因、发展的条件和最终的结果。通过研究这些矛盾之间的经济联系和逻辑关系，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需求大于供给的趋势不是偶然的。这种趋势又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某种危机，从而在理论上作出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结论。

## 我国现阶段个体所有制经济的类别和性质

(张 钢) (94)

本文简略分析我国现阶段几种不同类型的个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

(一) 个体自给品生产，即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二) 个人服务，即个人作为独立的私人以其服务性的活劳动同他人的物化劳动相交换。(三) 非资本的“小资本”，即个体小商贩的小本买卖。(四) 个体商品生产或小商品生产，即以个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商品生产。

## 婚姻问题初探

(李银河) (97)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我国的婚姻形式作了初步探讨：(一) 历史，(二) 现状，(三) 婚姻道德，(四) 未来婚制。

文章描述了我国婚姻形式的历史和现状，在阐明现实婚姻状况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了它必将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景。文章公布了一些社会调查的结果，介绍了国外婚姻形式几种值得注意的动向，并就极为敏感的婚姻道德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见解。

## 谈谈牛虻的感情

(毛 茅) (119)

《牛虻》再版加上了很长的前言后记，其中主要观点却几乎全都是借的。本文分析了牛虻与各主要人物的关系。蒙泰尼里主教并不阴险，而且有其人格高尚的一面；然而他又是敌人。这才使牛虻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感情。

# 目录·提要

## 论文理两科方法论的共同基础（李湘鲁）（1）

人们常常认为文理两种方法有本质的差别，其实，作为科学，它们是建立在统一的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史上，理科，主要是物理学，最先把精密科学的奖杯拿到手，最早使用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和实验法。人们一般把这三种方法叫作理科方法。十九世纪的“理科方法”无法应付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复杂现象。用“理科方法”治人文科学的，有人，但不成功。所以人文科学不得使用很多过时的，含混的方法。

人文科学方法的改造在二十世纪新的科学规范——随机和系统思想、新的技术手段——电子计算机出现后才有了可能；理科随着涉及更复杂的对象，也变得有了文科味道，这里指的是较多的综合。科学方法的新发展是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是文理两科方法论的共同基础。

## 马克思主义的对象和作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 （梁中锋）（12）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即是人们探索客观世界的工具，又是人们研究的对象。科学与迷信水火不相容，它不容垄断，它必须发展。要害在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把客观事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同时又把自己作为需要被研究、被发展的对象；允许事实的比较，对照和检验，马克思主义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生存发展和最起码的条件。

“可分的”还是“分立的？” (曹南燕) (18)

###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一段话的质疑

作者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中有关段落的考证，指出《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转述黑格尔关于可分性问题的观点时，可能出现了一个笔误。这一笔误使人们对于可分性问题的辩证观点产生了重大误解，因而有必要予以更正。

### 对人性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分析 (胡平) (23)

本文对人性研究中四个问题作出了一些分析：关于人的本质，关于抽象人性，关于利益对抗与共同人性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可变性与不变性问题。

文章对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中那句著名论断提出了新的理解：对否认抽象人性一说表示了异议；指出在存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之处也常常有着共同人性；强调对人性的变与不变作一种生动的辩证的认识，文章认为：人性变化的最大特点在于，人是通过自身独具的本性的活动去改变自己、创造自己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本性的可变性正是人的不变的本性。

### 历史的沉思 (金观涛 刘青峰) (32)

####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

本文是应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的一次尝试。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分别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几个方面，探讨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但很少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周期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周期性，是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呈周期性出现的两、三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大动乱，改朝换代。

文章抓住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与周期性这两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及作用机制入手,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模型。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稳定性正是这种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

文章分析指出,在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要维持大一统的封建超级大国的统治,就必然要使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高度一体化,组成相对脱离经济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机构。并进一步分析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土地兼并趋势,以及官僚政治所必然产生的机构庞大和腐化趋势。这是两种瓦解封建国家的恶性膨胀的力量。解决这两个社会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靠大动乱来消灭它们。然而,这种大动乱是没有播种的耕耘,没有“立”的“破”,破坏了生产力的积累和进步。文章还从超稳定系统出发,对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如农民战争的作用、土地所有制、封建王朝的变法改革、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试从信息流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白南生)(70)

用四种流的方法研究经济过程,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本文独辟蹊径,从信息流的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近三十年来,人们对信息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文章提出,在分配中应尽量减少信息传递的损耗,并保证信息的丰富性。通过简要的历史比较和一个“基本工资加分成工资制”的具体设想,文章论述了应根据在分配中的功能合理划分考核指标,并将这些指标组成一个并联的信息通道。

### 三十年来我国需求大于供给趋势的初步探讨

(黄江南)(82)

本文从指令性计划体制与我国现实经济条件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分



析了几个主要方面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探讨了矛盾产生的原因、发展的条件和最终的结果。通过研究这些矛盾之间的经济联系和逻辑关系，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需求大于供给的趋势不是偶然的。这种趋势又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某种危机，从而在理论上作出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结论。

### 我国现阶段个体所有制经济的类别和性质

(张 钢) (94)

本文简略分析我国现阶段几种不同类型的个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

(一) 个体自给品生产，即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二) 个人服务，即个人作为独立的私人以其服务性的活劳动同他人的物化劳动相交换。(三) 非资本的“小资本”，即个体小商贩的小本买卖。(四) 个体商品生产或小商品生产，即以个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商品生产。

### 婚姻问题初探

(李银河) (97)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我国的婚姻形式作了初步探讨：(一) 历史，(二) 现状，(三) 婚姻道德，(四) 未来婚制。

文章描述了我国婚姻形式的历史和现状，在阐明现实婚姻状况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了它必将丧失其存在的前景。文章公布了一些社会调查的结果，介绍了国外婚姻形式几种值得注意的动向，并就极为敏感的婚姻道德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见解。

### 谈谈牛虻的感情

(毛 茅) (119)

《牛虻》再版加上了很长的前言后记，其中主要观点却几乎全都是错的。本文分析了牛虻与各主要人物的关系。蒙泰尼里主教并不阴险，而且有其人格高尚的一面；然而他又是敌人。这才使牛虻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感情。

# 论文理两科方法论 的共同基础

李湘鲁

本文作者30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学生)

最近数百年间人类文明进步最显著的方面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其中所指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相当一段时间里,Science一词在英文中只是Natural Science的简称。现在中外知识界一般泛泛谈到科学一词时,也大都指自然科学而言,至于社会科学,多数学者认为是“明显地处在科学前阶段”。据国外统计,全世界从事研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分子(不算工程技术人员)从上世纪末到现在的八十年中人数增加了四百倍,对此,美国未来学家D·贝尔在其名著《工业化后社会的到来》中预言:“由于技术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扩大,它(指工业化后社会)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和文科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所谓问题,无非是文理两科因为领域和方法各异而造成的言语不通和“门户之见”。很明显,贝尔所说的问题是存在的,但很难同意它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文理两科相互融汇的趋势也很早就存在,并且在最近几十年内又有大的发展。这是国外知识界的情况。

至于我国,三十年来知识界文理之间语言相隔的情况比国外严重得多,重理轻文相当普遍;社会科学界陈陈相因,不注意吸

取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者大有人在。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左”的政策和思想的干扰。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中禁区更多。禁区之一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和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成果和技术手段，把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的工作统统看作伪科学，这是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没有取得应有成绩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已有不少人提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互通语言和两军相汇的问题，在高教界，有复旦大学党委发出“文理相通”的号召，文理相合的潮流已经为不少人相信，在这样的时候，回顾一下两个世纪间文理科学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趋势，是有益的，本文想仅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起。

## 一、两种方法

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即所谓理科，是指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包括它们内部的分学科以及派生学科和相互结合的边缘学科，或许还可以加上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或称文科，则是包括哲学在内的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总称，其中也有不少的派生和边缘学科。从严格意义上讲，数学和哲学不属于这两类科学的任一支，数学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物质对象，而是数量关系，社会科学中象自然科学一样，存在大量的数量关系，所以数学不能为自然科学专揽；而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当然，对于上述的分类我们不妨姑且从之，这样讲起来比较方便。实际上，数学作为理科，特别是物理学的主要方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而哲学，从方法上讲与其他社会科学更有近似之处。

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说都是从“那个伟大的时代”

（恩格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最初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样，都是集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巨人，如马基雅弗利。如果借用T·库恩的话，那么，文理两科在当时都接受了新的科学规范，从许多方面讲，规范都是一致的。

从那以后，分化就开始了。近代科学思想或者说新的科学规范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力学远远超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那种“物体天然运动在于趋向它的自然位置”定性式的讨论，它已经计算出了天体运行的轨道，这比砍下一两个国王的脑袋还要震动世界；而社会科学，从方法上讲，则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的水平。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尽管有许多人包括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在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制度鸣锣开道，尽管伟大的社会变革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作为科学，它远非精确和严密，甚至基本上是唯心的。

十九世纪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收获期，工业革命的成功来自自然科学，它又进一步刺激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已经开始各成体系，以物理学方法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已经成熟，一般讲，自然科学方法或称理科方法不外以下三种：

（1）数学方法。古希腊人说，那里有数，那里就有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质。这种思想对近代欧洲有很深的影响。因此J·朗道尔说：“科学产生于用数学解释自然的信念……这是近代科学的规范之一。物理科学中运用数学的成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代数学，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实、复变函数论和泛函分析等许多新的分支发展起来，丰富了数学对物质世界运动的描述，至此，数学已经可以用来预言新的物理现象而不是仅仅描述已被发现的物理现象了。

(2) 分析方法。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把复杂的现象分解为基本的部分和过程，就是笛卡尔在《方法论》第二条规则中所说的：“把问题尽可能分成细小的组成，深入地研究每一个部分”。原子论成了不可动摇的规范，\* 人们想认识物质的本源，开始向微观层次进军。这是分析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素或变数分析，研究对象的某种状态是几个简单要素综合的结果。十九世纪这种分析多是单值和线性的。

(3) 实验方法。自然科学家主要依靠在实验室对现象进行观察和对理论进行验证。上个世纪的大部分自然科学成果都出自实验室。实验创造了典型和单值条件，它对技术科学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把社会科学的方法置于科学之上。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无法比拟的。然而，就从事研究的具体方法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还是依靠对历史材料的分析，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对待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比较起来，它依然有如下弱点：

(1) 没有度量概念，不使用数学语言；推证含混；

(2) 无法从事精确的特别是单值分析；

(3) 无法在实验室观察和验证，甚至找不到证实标准，实践验证也须很长的时间。

我们虽然不能把这几条当作阻碍社会科学进步的主要问题（应该说，在这个领域中，阶级偏见对于人们达到真理有着重要影响），但至少它会使人产生完善社会科学方法的要求。所以，

\* 十九世纪末对原子论曾经产生普遍怀疑。见《历史上的科学》。

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方法似乎是战胜攻取、所向披靡的时候，许多自然科学家或受过良好的自然科学方法训练的人把目光投向社会科学就不奇怪了。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还是化外之地，那里模糊的界说、无穷的争论、经不起推敲的证明实在太多。向社会科学的进军于是开始。依今天观点看，这些人的起点比历史唯物主义低得多，对社会科学问题未免有些“书生轻狂”，但他们是开创者。这就很不容易。

## 二、越人藩篱

“我以为我们的时代从物理科学学到了不少的教训”。——著名物理学家、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赫尔姆霍茨这句话未免有些趾高气扬，却很有代表性，十九世纪的科学史证实了他的观点。

从一八三八年法国数学家古诺第一次把均衡理论和数理方法结合起来以后，用数理方法处理经济问题的风气渐盛。十九世纪后半期瑞士学者瓦尔拉建立“全部均衡经济学”，创立了数理经济学派即洛桑学派，他们将一般相互依存和制约的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关系表示为数学上的函数关系——多元方程组，以确定经济变动的原因和结果，这是狭义的数理经济学派。广义的，则包括所有用数学公式、曲线去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规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在上个世纪末已经不是少数了。

数理统计方法开始应用于社会学的大范围统计，统计结论代替了直觉和臆测。社会学的数理统计方法是比利时的数学家奎特勒最早采用的，英国社会统计学家法尔改进了社会保险和医药方面的统计，建立了科学的人口统计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很深的影晌，创始人之一的斯宾塞就是一名生物学家。

十九世纪前的心理学属于哲学，实验心理学是十九世纪中叶

以后的事情，它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最早的心理实验是德国的费希纳设计的，他从中得出了著名的心物规律或叫作心理物理学规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是他的同胞冯特于1879年建立的。赫尔巴特则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了数学方法。

社会科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十九世纪仅仅是滥觞之始，到二十世纪，这种趋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特点之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的出现，一种新型的综合学科或叫横断学科被提出来，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学、未来学、科学学以至于协合学，它们或以社会、自然两界结构或运动形式某一特定的共同方面为对象，或以科学本身和未来为对象，横跨文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顺便提一句，综合学科的倡首者几乎全部是自然科学家，看来，二十世纪文理相合的主动权还在他们手里。特点之二，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学方法对许多复杂的问题不仅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同时有了实际的意义，科学中使用数学就有了真正的可能。

知识界这种沧海横流的变化无法一一列举，经济学中，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大宗。计量经济学建立经济数学模型，加工和处理统计数据，从而对经济理论给予实验内容并进行经济预测，使经济学变成了精密科学。社会学中的行为科学几乎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控制论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已经开始被从数量方面进行研究……这是大家了解得较多的。其它，如语言学，现在也跟数学、生理学、电子学、计算技术、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同样成为信息论和控制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语言学已有数理语言学、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算法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工程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文理相交的分支。

成熟最早、传统最深的社会科学当属历史学，而今这位“太

史公”也赶起了时髦。数量史学从五十年代起开始出现并获得引人瞩目的进展。数量史学来自历史学的结构主义，它使用统计手法整理和分析历史资料，通过分析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建立数学模型，在电子计算机上演算从而得出较为精确的历史结论。曾有日本人用此方法推算出日本绳纹时代的人口、食品结构和经济结构，苏联学者推算古希腊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规模。美国到一九七八年已有八百所大学使用计算机进行数量史学的研究。

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有什么联系？上个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其牵强比附而沦为伪科学。但近数十年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提出了人的社会性部分取决于人的遗传基因，这就是近几年人们十分关切的社会生物学，课题属于社会科学，方法全然是自然科学的。

连文学研究中也用上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例如用概率和数理统计方法（判别函数和簇类分析），可以对文章的频谱和固有值进行分析，从而区别和鉴定作者风格；数学中的倍尔数可用于计算诗的押韵分式，这些不是海外奇谈，近年来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

总之，当今社会科学各大学科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没有一家没有与自然科学结婚挂钩的分支，翻开近些年出版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很容易碰到一些看起来“不伦不类”的东西，你说它是社会科学，它却尽是数学公式，图表一类玩意儿，你说它是自然科学，它又实实在在是社会科学的题目，每每有些人的议论纵横于文理两界，很难确定他们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尽管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应有一个批判吸收的态度，但上述情况，不是至少可以有些启发吗？而且，在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知识界中，文理相合也受到高度重视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不值得我国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吗？



杰出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指出：“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难道这仅仅是臆想吗？”从社会科学吸取自然科学方法的历史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条“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 三、谨毛而失貌

谈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那些毫无表情的技术知识分子终于用计算机和讨厌的代数式把文科的题目都算出来而让文科先生们无法讨生活？看起来可以不必担心。其一，计算机和数学不是万能的；其二，从十九世纪看，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田里收获是很可怜的，他们撒下了谷种而收获多是稗子；其三，二十世纪到目前文科采用理科的方法也仅仅是开始，或者说仅仅是开始有了一点实际意义。

十九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然科学方法建立在两个迷信上，一个是对确定性的迷信；一个是对分析的迷信。迷信确定性的人认为宇宙的规律天然是精确的，象数学一样，你如果算不出来的话仅仅是因为本事不够；相信分析的人认为微观层次的机制是宏观状态的根本原因，了解了每个分子的动作你就能说明这个气团的状态，了解了细胞等于了解了有机体，知道每个人的意念和动作就可以解释社会。一句话，典型的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方法是求精求细的，但这个办法在自然科学自己的圈子里就行不通，例如生物科学，生命体就不是上亿个细胞简单堆砌的结果，物理主义对生物学毫无补益；甚至在力学中，一个三体问题就让喜欢精确性的人叫苦不迭，还让他如何去计算上万亿个气体分子的相互作用呢？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问题比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光人的随意性就使精密分析无法下手。用W·韦弗的话讲，上个世纪自然科学